

郭双林
总策划

大学历史论文读本系列

史学史读本

Readings in History:
History of Historiography

| 张 越 编 |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史学史读本

Readings in History:
History of Historiography

| 张 越 编 |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史学史读本/张越编.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1

(大学历史学论文读本系列)

ISBN 7-301-09525-2

I. 史… II. 张… III. 史学史-高等学校-教学参考资料 IV. K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32679 号

书 名: 史学史读本

著作责任者: 张 越 编

责任编辑: 岳秀坤

标准书号: ISBN 7-301-09525-2/K·0395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cbs.pku.edu.cn> 电子信箱: pkuswsz@yahoo.com.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2025

排 版 者: 北京军峰公司

印 刷 者: 河北三河新世纪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650mm × 980mm 16 开本 28 印张 445 千字

2006 年 1 月第 1 版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5.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

本书精选史学史研究的论文，内容以中国史学史研究为主，兼及西方史学史研究。如中国史学史研究中的经史关系、文史关系、史学的经世致用、古代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近代以来从历史观到史料观念的转变、中西史学之交流与比较、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对近现代史学家的个案研究等问题，是本书选录的重点。

编者

张越，1962年生，历史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副教授。主要研究领域是史学理论及史学史，尤其是中国近现代史学。著有《中国清代思想史》、《五四时期中国史坛的学术论辩》等。

大学历史学论文读本系列

史学理论读本

刘北成 陈 新 / 编

史学史读本

张 越 / 编

中国古代史读本（上、下）

陈苏镇 张 帆 / 编

中国近代史读本（上、下）

郭双林 王续添 / 编

外国史读本（上、下）

彭小瑜 高 岱 / 编

历史地理学读本

唐晓峰 黄义军 / 编

考古学读本

杨 楠 / 编

责任编辑：岳秀坤

装帧设计：奇文云海   
qwyh_cn@yahoo.com.cn

总 序

编辑出版这套《大学历史学论文读本系列》，主要是基于这样一个愿望：配合高校历史学专业的教学，在教材和原始文献资料之外，为广大学生提供一个研究性学术论文的选本。

教学改革是个常讲常新的话题。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教育行政部门采取了一系列教学改革措施。就历史学专业而言，在课程设置方面，为促进学科间的渗透，在学科主干课之外，一些院校先后开设了文学、哲学甚至数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课程；在课时安排上，压缩课堂授课时间，增加课外阅读量；在教学方法上，满堂灌的教学方法逐渐被淘汰，研究型、启发式教学得到提倡；在教学手段上，多媒体得到推广。随着这些改革措施的推行，教学质量有了明显的提高。

但是毋庸讳言，随着近年的扩招，教育资源严重不足，一些院校的教学质量呈下滑趋势。其中在大学本科（甚至包括部分研究生）中存在着两个比较明显的问题：一是阅读量严重不足，二是写作能力亟待提高。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一方面固然受教学条件的限制，但更重要的是受旧有教育观念束缚。为了增加广大学生的阅读量，教育部高等学校历史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于2002年向全国高校历史系主任联席会议推荐了《普通高等学校历史学专业本科生基本阅读书目》。为了提高学生的写作能力，我们今天又编辑出版了这套历史学专业学术论文读本。

本套丛书所选文章，为自近代新史学产生以来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按照学科分类，编为《中国古代史读本》（上下册）、《中国近代史读本》（上下册）、《外国史读本》（上下册）、《史学理论读本》、《史学史读本》、《历史地理学读本》和《考古学读本》等7种10册，每册40余万字，共计400余万字，涵盖了历史学专业除历史文献学、专门史以外的6个二级学科。参编人员为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复旦大学和中央民族大学历史专业的部分中年教师。

我们选文的标准主要包括以下四点：（1）知识性。即选文适当考虑覆盖面，尽可能顾及时间跨度和不同的知识领域。（2）典型性。即所选文章

在研究思路上应该具有比较突出的创新性,或者说范式意义,可供读者反复品味揣摩。(3)规范性。即论文题目的选择、切入的角度、思维逻辑的展开、资料的运用和文字表述必须符合学术论文的写作规范。(4)可读性。即入选文章在行文上应该明白晓畅,或独具一格。

除此之外,我们还特别作了如下规定:第一,编选者的文章概不入选;第二,重文不重人;第三,除个别卷帙外,原则上全书每卷每人最多只限选一篇;第四,海外作者要占到一定比例;等等。

由于全书跨度太大,受既有知识储备的制约,目前的中年学者很少有人能贯通各卷。为名实相符,本丛书只设总策划而不设总主编。总策划负责全书的策划和组织工作,质量则由各卷编选人员自己负责。

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虽然编委会对编选方针和原则进行过多次讨论,但真正操作起来,颇难完全一致;加之入选文章涉及众多领域,出自多人之手,时间跨度比较大,因此相互之间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水平和风格上的差异。

编选这样一套学术论文读本,可能是一项出力不讨好的工作。因为可以入选的文章太多,受全书规模的限制,不可能使所有高质量的文章都能入选。为了弥补这一缺憾,我们特别在每篇之后增加了参考篇目,一则可使读者加深对同一问题的理解,再则可以开阔人们的视野,以便进一步扩大阅读范围。即便这样,对哪些文章应该入选,哪些文章应该列入参考篇目,拿捏起来亦颇感困难。见仁见智,尽力而为。聊以自慰,亦堪自嘲。

记得白寿彝先生在一封与人论读书的短笺中说过:“读书之‘读’,似应理解为书法家读帖读碑之读,画家读画之读,而不是一般的阅览或诵习。”先生还以《诗经·邶风·墙有茨》中将“不可读”排在“不可道”、“不可详”后面来说明,认为“读”有“抽绎”的古义。(《与人谈读书》,《白寿彝史学论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作为编者,我们也希望读者在阅读这套丛书时,能像书法家读帖读碑,画家读画那样,细细品味,反复揣摩,真正从中学到一些东西。

最后,特别要指出的是,本丛书得到北京大学出版社领导和张凤珠女士的大力支持,责任编辑为本书的出版付出了大量劳动,在此谨致谢意。诚望海内外方家和读者批评指正。

郭双林

2005年10月

目 录

总序	郭双林/I
说“疏通知远”	白寿彝/1
中国古代史学理论发展大势	瞿林东/15
经学与史学	钱穆/37
中西古代史学的比较	杜维运/52
论司马迁的“成一家之言”	施丁/76
《汉书》历史地位再评价	陈其泰/94
六朝时期的文史之学	胡宝国/113
裴松之与《三国志注》	杨翼骥/130
魏收之史学	周一良/149
唐宋时代设馆修史制度考	金毓黻/178
清代国史馆考述	乔治忠/190
章学诚的史学	内藤湖南/209
《山海经》与近代中国史学	罗志田/220
梁启超史学理论体系新探	胡逢祥/240
20世纪唯物史观派史学的学术史意义	
王学典 陈峰/256	
希腊—罗马的历史编纂学	柯林武德/277
传统与古典史学家	莫米利亚诺/307
谱系:中世纪历史叙述中的形式和功能	斯皮格尔/323
从英国先期浪漫主义到赫尔德的历史思想	
张贵永/336	
美国与德国历史思想中的兰克形象	伊格尔斯/355
文明史	古奇/386
布罗代尔:历史学家;“局势中的人”	沃勒斯坦/407
近代以来西方史学反省的历史考察	张广智/420
编后记	张越/440

说“疏通知远”

“通”和“通史”的观念，是中国史学的重要特色。中国史学强调“通”，并引申为“疏通知远”的认识，其传统来自先秦诸子的历史思想。本文指出，“疏通知远”包含了运用历史知识观察历史动向和依据历史知识提出对未来的想法这两个内容，列举孔子、墨子、商鞅、孟子、荀子、韩非等家的言论，论述了史学求“通”的传统，及春秋战国时期对历史发展的观察和对历史知识的运用，首次对中国古代史学中“通”的概念及“疏通知远”的涵义作了阐发。

白寿彝(1909—2000)，河南开封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史学研究所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通史、中国史学史、史学理论、民族史、中国交通史，主编《中国通史纲要》、多卷本《中国通史》、《史学概论》，著有《学步集》、《历史教育和史学遗产》、《中国史学史》(第一册)、《中国史学史论集》、《民族宗教论集》等。

《礼记·经解》：“疏通知远，《书》教也。”实际上，“疏通知远”是先秦人运用历史知识的一种表现形式，并不仅仅限于《书》。所谓“疏通知远”，可以包含两个意思，一个是依据自己的历史知识观察当前的历史动向，另一个是依据自己的历史知识提出自己对未来的想法。

孔子说：“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1]孔子的这段话，表示他对当时历史动向的看法。他认为，当时的形势是越来越坏，是天下无道的时期。所谓“无道”、“有道”，这就是一种历史比较。他的看法不一定符合客观实际，但总是按着他对历史的理解来立论的。“天下”的概念，在宗周时期就已经有了，但春秋以后，这个概念逐渐鲜明起来。“天下”是一个历史概念，是不断发展的，但总是指一定时期内人们视野所能达到的广大地区。孔子论“有道”和“无道”，是就“天下”而言，也反映孔子观察当时形势的广阔眼界。

孔子见到局势在变，但他看不到局势还要变下去，而是希望要变回来。所以他说：“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2]，“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3]当然，这也是他的历史理想，但这个理想因不符合于历史发展中的现实，落空了。但他重视“天下”，这不只在后来的儒家思想中，而且在后来的墨家和法家的思想中都得到发展。

墨子目击当时的战乱，认为对任何国家来说，打仗是没有出路的。挨打的国家受害，打别人的国家也不利。他援引史事，指出即使战胜，也可以亡国：

古者吴阖闾教七年，奉甲执兵，奔三百里而舍焉。次柱林，出于冥隘之径，战于柏举，中楚国而朝宋与及鲁。至夫差之身，北而攻齐，舍于汶上，战于艾陵，大败齐人而葆之大山。东而攻越，济三江五湖，而葆之会稽。九夷之国莫不宾服。于是退不能赏孤，施舍群萌，自恃其力，伐其功，誉其智，急于教，遂筑姑苏之台，七年不成。及若此，则吴有离罢之心。越王勾践视吴上下不相得，收其众以复其讎。入北郭，徙大内，围王宫，而吴国以亡。

昔者晋有六将军，而智伯莫为强焉。计其土地之博、人徒之众，欲以抗诸侯。以为英名攻战之速，故差论其爪牙之士，皆（比）列其舟车之众，以攻中行氏而有之。以其谋为既已足矣，又攻兹范氏向大败

之。并三家以为一家而不止，又围赵襄子于晋阳。及若此，则韩魏亦相从而谋曰：古者有语，唇亡则齿寒。赵氏朝亡，我夕从之。赵氏夕亡，我朝从之。诗曰：鱼水不务，陆将何及乎？是以三主之君一心戮力，辟门除道，奉甲兴士，韩魏自外，赵氏自内，击智伯，大败之。^[4]

墨子所举两例，不足以充分说明夫差和智伯在战争上的胜利是他们亡国的唯一原因，但可以说明战胜不是强国的唯一因素。墨子又说：“计其所自胜，无所可用也。计其所得，反不如所丧者之多。今以三里之城、五里之郭，攻此不用锐，且无杀而徒得此然也。杀人者，多必数于万，寡必数于千，然后三里之城、七里之郭，且可得也。”^[5]这可见当时战争中，城郭争夺的激烈，也可见墨子对这种情况的深切关怀。

面对这种战乱的情况，应该怎么办？墨子对历史前途的理想，一是要兼爱，又一是要上同。这样，战乱可以终止了，社会可以新面貌出现。他论述兼爱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说：

圣人以治天下为事者也，不可不察乱之所自起，当察乱何自起。起不相爱。……若使天下兼相爱，爱人若爱其身，犹有不孝者乎？视父兄与君若其身，恶施不孝，犹有不慈者乎？视弟子与臣若其身，恶施不慈？故不孝不慈亡有，犹有盗贼乎？故视人之室若其室，谁窃？视人身若其身，谁贼？故盗贼亡有。犹有大夫之相乱家、诸侯之相攻国者乎？视人家若其家，谁乱？视人国若其国，谁攻？故大夫之相乱家，诸侯之相攻国者亡有。若使天下兼相爱，国与国不相攻，家与家不相乱，盗贼无有，君臣父子皆能孝慈。若此，则天下治。故圣人以治天下为事者，恶得不禁恶而劝爱，故天下兼相爱则治，交相恶则乱。^[6]

他论述上同的想法说：

夫明乎天下之所以乱者，生于无政长。是故选天下之贤可者，立以为天子。天子立，以其力为未足，又选择天下之贤可者置立之，以为三公。天子三公既以立，以天下为博大，远国异土之民是非利害之辩不可一二而明知，故画分万国，立诸侯国君。诸侯国君既已立，以其力为未足，又选择其国之贤可者置立之，以为正长。正长既已具，天子发政于天下之百姓，言曰：闻善而不善，皆以告其上，上之所是，必皆是之，所非，必皆非之。上有过则规谏之，下有善则旁荐之。上

同而不下比者，此上之所赏而下之所誉也。意若闻善而不善，不以告其上。上之所是弗能是，上之所非弗能非。上有过弗规谏，下有善弗旁荐，下比不能上同者，此上之所罚而百姓所毁也。〔7〕

墨子的兼爱思想，反映了人们在长期战乱中对未来的美好生活的向往。但这种理想是寄托在人们的善良愿望上，墨子没有提出来如何实现这种理想的客观条件。而且兼爱是对所有的人说的，这就是超阶级的不现实的想法。后来历史的发展证明，只有被统治者有爱统治者的义务，他们并没有被爱的权利。墨子的上同思想是要求有一个圣王天子和层层贤政长来进行治理。但掌握政权的各级人物，很难就是圣贤。当他们当权的时候，要求人民于“上之所是，必皆是之；上之所非，必皆非之”。这只能是培育君主专制的温床。历史证明，墨子的主张，后来是实现了一半的，但因为另外的一半被抛弃了，实现了的这一半也就变了质。

战国时期主张变法的人物，大致是法家人物。他们都更敏感地看到世局的变。他们不相信世局会变回来，而相信会变下去。他们认为在具体的作法上不必一致，但采取行政手段适应历史趋势是一致的，而且事实上也起了推动历史发展的作用。

商鞅认为历史是不断发展的，应该看清历史的趋势，采取果断的措施，这里可以看看《商君书》里所保留的有关议论。《商君书·开塞》把历史分为上世、中世和下世。上世是“天地设而民生”的时代，“民知其母而不知其父。其道亲亲而爱私”。这说的是原始的以血缘关系组织起来的社会。中世是“上贤而悦仁”的时代，“仁者以爱为务而贤者以相出为道”。这个仁者的爱，比“亲亲而爱私”的爱要恢廓得多。“出”，依《释名》训“推”，“推而前也”。这是说扩大私爱而推选贤者来主事，这个贤者“立中正，设无私”，还是社会公仆的性质。这说的是原始社会的晚期。下世是“贵贵而尊官”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作为土地货财男女之分。分定而无制，不可，故立禁。禁立而莫之司，不可，故立官。官设而莫之一，不可，故立君。既立君，则上贤废而贵贵立矣。”这说的是进入阶级社会的时代，私有财产出现了，国家建立了，君主、职官和禁令也都有了。依商鞅所论，社会系由低级向高级、由简单到复杂的阶段性发展。这不免有理想化的成分，但已触到历史发展的真实的边缘，这在先秦诸子中是很难得的。但根据这种看法，对当时历史发展的趋势，显然认为是沿着下世“贵贵而尊官”的途径发展下去的。他在秦变法的措施中，奖励耕战、严明赏罚，提高统

治者的权威,都是跟他的历史观点有密切联系的。历史证明,他的变法是有效效的。当时的秦国是以强国为务,还没有统一天下的想法,所以商君的思想里似乎也还没有一个更远的社会理想。但实际上,他在政治上的措施,是有利于秦向封建社会过渡的。

商鞅以后,有赵武灵王,有孟子和荀子,有李斯和韩非,都运用了历史知识观察当前和未来的重大问题。

赵武灵王于公元前 307 年决定胡服以便骑射。他的想法遭到宗室和大臣们的反对。赵武灵王说:“今吾国东有河、薄洛之水,与齐、中山同之,而无舟楫之用。自常山以至代、上党,东有燕、东胡之境,西有楼烦、秦、韩之边,而无骑射之备。故寡人且聚舟楫之用,求水居之民以守河、薄洛之水;变服骑射,以备其参胡、楼烦、秦、韩之边。”这是从边境的形势上说明胡服的需要。接着,赵武灵王就回顾赵国的历史说:“昔者,简主不塞晋阳以及上党,而襄王兼戎取代,以攘诸胡,此愚知之所明也。先时,中山负齐之强兵,侵掠吾地,系累吾民,引水围鄗,非社稷之神灵,即鄗几不守。先王忿之,其怨未能报也。”^[8]这是从历史上看先王的作法和意志,胡服是可以的。接着,他就说:“今骑射之服,近可以备上党之形,远可以报中山之怨。”此外,赵武灵王还一再申述变服的历史依据说:“三代不同服而王,五伯不同教而政。……故势与俗化,而礼与变俱,圣人之道也”,“古今不同俗,何古之法?帝王不相袭,何礼之循?伏羲、神农教而不诛,黄帝、尧、舜诛而不怒。及至三王,观时而制法,因事而制礼,法度制令,各顺其宜,衣服器械,各便其用。故礼世不必一其道,便国不必法古。圣人之兴也,不相袭而王。夏殷之衰也,不易礼而灭。然则反古未可非,而循礼未足多也。”^[9]民族性的服装是一种民族形式,改变民族性的服装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在古代更是如此。赵武灵王坚决要胡服,这固然是关系到当时赵国的军备和立国问题,但还是有一个历史的看法问题。宗室大臣的反对,主要是以维护历史传统为重要的理由,而赵武灵王对他们的答复,也主要是从历史上作了回答。胡服以后,赵国取得了军事上的一系列的胜利,这当然不只是因胡服一事的成效,但是胡服所体现的是适应历史发展的精神所取得的成效。

孟子对于当时的历史趋向,是有一个明确的看法的,对于未来社会也有他的理想。梁襄王曾问过他:“天下恶乎定?”孟子答:“定于一。”又问:“孰能一之?”答:“不嗜杀人者能一之。”^[10]这两句答词只 11 个字,是孟子

对于战国局势的论纲。他认为,战国终要归于一统,而完成这个历史任务的只有“不嗜杀人者”才能担负起来。他并不对杀人一概反对,他还说过“国人皆曰可杀,然后察之。见可杀焉,然后杀之”。^[11]在他的话里,“嗜”字很重要:杀人不是不可以,“嗜杀人”就不行了。他说:“善战者服上刑,连诸侯者次之,辟草莱、任土地者次之。”^[12]这话跟商鞅的耕战政策正好针锋相对。从战国的结局看,商鞅的想法是有效果的。从更远的历史看,孟子的话倒是说对了。秦始皇灭六国,并不能使天下“定于一”,而能“定于一”者应该说是“不嗜杀人者”的刘邦和他的伙伴。

但如何结束战国的局面,孟子认为应该顺行王政。行了王政,就可以无敌于天下。他说:“尊贤使能,俊杰在位,则天下之士皆悦而愿立于其朝矣。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则天下之商皆悦而愿藏于其市矣。关,讥而不征,则天下之旅皆悦而愿出于其路矣。耕者,助而不税,则天下之农皆悦而愿耕于其野矣。廛,无夫里之布,则天下之民皆悦而愿为之氓矣。信能行此五者,则邻国之民仰之若父母矣。率其子弟攻其父母,自有生民以来未有能济者也。如此则无敌于天下。无敌于天下者,天吏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13]孟子在这里,没有提到军事上的需要,但他也并不完全反对打仗。孟子说:

齐人伐燕,取之。诸侯将谋救燕,宣王曰:“诸侯多谋伐寡人者,何以待之?”孟子对曰:“臣闻七十里为政于天下者,汤是也,未闻以千里畏人者也。《书》曰:‘汤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东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为后我?’民望之,若大旱之望云霓也。归市者不止,耕者不变,诛其君而吊其民,若时雨降,民大悦。《书》曰:‘奚我后,后来其苏。’今燕虐其民,王往而征之,民以为将拯己于水火之中也,箪食壶浆,以迎王师。若杀其父兄,系累其子弟,毁其宗庙,迁其重器,如之何其可也?天下固畏齐之强也,今又倍地而不行仁政,是动天下之兵也。王速出令,反其旄倪,止其重器,谋于燕众,置君而后去之,则犹可及止也。”^[14]

这可见,孟子也主张可以打仗,但必须是吊民伐罪的义师,以攻城略地为目的的打仗是得不到什么好处的。当然,孟子的这种说法,在战国时期是不现实的。

孟子不断地强调王政。所谓王政,就是他对历史前途的设想。他曾

说过这样一个蓝图：

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

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15]

这个蓝图，就是封建社会里的小农经济，其特点是占有一小块土地的一家一户的个体生产。这个设想是符合当时历史发展的，秦汉以后容纳了广大劳动力的就是这种生产结构。

荀子结合历史，把国分为三个类型。第一个类型是可以王天下的国，这是“挈国以呼礼义而無以害之”，“行一不义，杀一无罪，而得天下”都不干的。汤武是这一类型的代表人物。“汤以亳，武王以鄣，皆百里之地也，天下为一，诸侯为臣，通达之属，莫不从服”。汤武为什么能做到这一点？荀子答：“无它故焉，以济义矣，是所谓义立而王也。”第二个类型是“刑赏已诺，信乎天下矣，臣下晓然皆知其可要也。政令已陈，虽睹利败，不欺其民；约结已定，虽睹利败，不欺其与”。五伯是这一类型的代表。“齐桓、晋文、楚庄、吴阖闾、越勾践是皆僻陋之国也，威动天下，强殆中国”。为什么？“无它故焉，略信也，是所谓信立而霸也”。第三种类型是“挈国以呼功利，不务张其义，齐其信，唯利之求，内则不惮诈其民而求小利焉，外则不惮诈其与而求大利焉。内不修正其所以有，然常欲人之有”，以致“臣下百姓莫不以诈心待其上矣，上诈其下，下诈其上”，如是则“敌国轻之，与国疑之，权谋日行，而国不免危削，綦之而亡”。齐闵公与薛公是这一类型的代表。他们之强，“南足以破楚，西足以诎秦，北足以败燕，中足以举宋。及以燕赵起而攻之，若振槁然，而身死国亡，为天下大戮”。这又是什么？答复：“是无他故焉，唯其不由礼义而由权谋也。”^[16]

“义”，是孟子所曾经强调的。孟子说：“仁，人心也。义，人路也”，把仁义都说成是先天所具有。荀子这里所说的“义”，似指人们应得的利益和应承担的责任，跟孟子所说的“义”，是有区别的。荀子经常说礼，又曾合称“礼义”。礼比义要具体些，指的是君臣、父子、兄弟、夫妻以及国与国

之间应分别遵循的活动规范。荀子又说法,法比礼是更具体的,是有强制性的国家的决定。礼、义、法在荀子社会思想中,是互相依存的,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在法家那里,大大发展了法,就把礼、义抛弃了。“仁”的思想,孔子也提过。孔子的学生子贡问政,孔子答复:“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问:“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孔子说:“去兵。”又问:“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答复是:“去食。”但没有饭吃怎么得了,孔子的解释是:“民无信不立。”^[17]这是说,没有信,就没有立国的可能,什么都谈不到了。但孔子说得简单,荀子对这个思想有所发展。

荀子曾到过秦国,对秦国的政治,有三段评论。一段评论是荀子答复应侯的话,应侯问荀子:“入秦何见?”荀子说:

其固塞险,形势便,山林川谷美,天材之利多,是形胜也。入境,观其风俗,其百姓朴,其声乐不流污,其服不佻,甚畏有司而顺,古之民也。及都邑官府,其百吏肃然,莫不恭俭、敦敬、忠信而不桀,古之吏也。入其国,观其士大夫,出于其门,入于公门;出于公门,归于其家,无有私事也;不比周,不朋党,倜然莫不明通而公也,古之士大夫也。观其朝廷,其朝闲,听决百事不留,恬然如无治者,古之朝也。故四世有胜,非幸也,数也,是所见也。故曰:佚而治,约而详,不烦而功,治之至也。秦类之矣。虽然,则有其谥矣。兼是数具者而尽有之,然而县之以王者之功名,则倜倜然其不及远矣!是何也?则其殆无儒邪!故曰:粹而王,驳而霸,无一焉而亡。此亦秦之所短也。^[18]

按照这段话来说,秦国似可归于第二类型的国,在信字上已颇有成就,但“县之以王者之功名”,则“不及远矣”。县,悬也。“县之以王者之功名”,即是以第一类型的标准去衡量,这是秦所做不到的。

荀子论秦的另外一段话,是说:

秦人其生民也狹隘,其使民也酷烈,劫之以势,隐之以隘,忸之以庆赏,鎡之以刑罚,使天下之民所以要利于上者,非斗无由也。隘而用之,得而后功之,功赏相长也。五甲首而隶五家,是最为众强长久,多地以正,故四世有胜,非幸也,数也。故齐之技击不可以遇魏氏之武卒,魏氏之武卒不可以遇秦之锐士,秦之锐士不可以当桓文之节制,桓文之节制不可以敌汤武之仁义。有遇之者,若以焦熬投石焉。兼是数国者,皆干赏蹈利之兵也,佣徒鬻卖之道也,未有贵上安制秦

节之理也。诸侯有能微妙之以节，则作而兼殆之耳！^[19]

按这一段话在说，秦国的锐士还敌不过齐桓、晋文的节制，似乎秦在第二类型里也排不上一个正当的位置，并且还不是没有亡国的危险。

荀子还有一段话，说秦“威强乎汤武，广大乎舜禹”，而“忧患不可胜校也，谥谥然常恐天下之一合而轧己也”。他提出秦应“节威反文，案用夫端诚信全之君子治天下焉，因与之参国政，正是非，治曲直，听咸阳，顺者错之，不顺者而后诛之”。若能这样，“兵不复出于塞外而令行于天下矣”。他说：“假今之世，益地不如益信之务也。”^[20]可以说，荀子认为，秦在立信上还很不够，秦的历史地位只可列在第二类型和第三类型之间。荀子对秦的历史前途的看法，实际上也是对战国的历史前途的看法。在这个问题的基本观点上，荀子是跟孟子相近的，但荀子更具体些，更有一些分析。秦的历史前途，跟荀子的观察实际上并没有很大的距离。

李斯和韩非是同学，都是荀子的学生。他们都离开儒家而进入法家。李斯是上蔡人。秦王政时，李斯在秦为客卿。秦王下逐客令，李斯也列在被逐者中。李斯上书陈述逐客之失策，书中说：

臣闻吏议逐客，窃以为过矣。昔缪公求士，西取由余于戎，东得百里奚于宛，迎蹇叔于宋，来丕豹、公孙支于晋。此五子者，不产于秦，而缪公用之，并国二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风易俗，民以殷盛，国以富强，百姓乐用，诸侯亲服，获楚、魏之师，举地千里，至今治强。惠王用张仪之计，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汉中，包九夷，制鄢、郢，东据城皋之险，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国之从，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范雎，废穰侯，逐华阳，强公室，杜私门，蚕食诸侯，使秦成帝业。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观之，客何负于秦哉！向使四君却客而不内，疏士而不用，是使国无富利之实而秦无强大之名也。^[21]

这一段话回顾秦缪公、孝公、惠王、昭王任用客卿的历史，指出这是使秦国逐步强大的历史。这都是当时的实际情况。秦在任用大臣的方面，信任客卿，使他们得以施展所长，这是秦得以不断打击本国的陈旧势力使国力不断上升的重要措施。书中的这一段话指出，秦国政治史上的特点和在任用客卿方面的成就，这是富有说服力的。接着，书中又从另外一个方面说：